

国内近三十年西突厥研究简述（1980～2010）

任宝磊

内容提要：西突厥汗国作为突厥民族在阿尔泰山以西建立的一大政权，与东突厥汗国相比既存在诸多共性，又在许多方面有其显而易见的特点，其在历史上的存在尤其对后世新疆和中亚的政治格局、文化面貌影响深远。本文便是对我国近三十年来西突厥研究进展及成果的简要评述。

关键词：西突厥 研究 简述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4—0128—08

19世纪以来，随着古突厥碑铭的发现和释读，突厥人及其建立的游牧政权日益成为国内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冯承钧、韩孺林、马长寿、岑仲勉等老一辈学者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此，前人已有总结。^①西突厥汗国作为突厥人在阿尔泰山以西建立的一大政权，与东突厥汗国相比既存在诸多共性，又在许多方面有其显而易见的特点，其在历史上的存在尤其对后世新疆和中亚的政治格局、文化面貌上影响深远。法国汉学家沙畹曾于上世纪初出版了《西突厥史料》一书，1932年由冯承钧先生译成中文；1958年岑仲勉先生又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对上书存在的疏漏和错误进行了校正。然而除上述两书外，国内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以林幹、薛宗正、吴玉贵等学者的论著为代表，西突厥研究才有了长足进展。经过近三十年来的积累，已经有一大批富于建设性的成果问世，一些热点问题虽尚未形成共识，却已形成了争鸣讨论的良好学术氛围。

一、突厥汗国的分裂和西突厥汗国的形成

作为突厥汗国向西方扩张的产物，西突厥汗国何以从整个汗国内部脱离开来，以及它真正的创建者和形成时间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

1982年，《历史研究》发表了王譔的《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兼论突厥汗国的分裂与西突厥汗国的形成》一文。文中将突厥汗国分裂的原因总结为两点：一是大可汗继承制混乱造成的内部矛盾；二是隋朝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政治策略。然而同时期林幹先生发表的文

^① 参见林幹《近六十余年（1919—1984）国内突厥史研究评述》，《民族研究》1985年第6期；韩中义《北亚突厥百年研究（1900—2000年）》，《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

章《略论西突厥史中的若干问题》却认为，突厥统治阶级为夺取最高权力的纷争和隋朝奉行的离间策略只是相对次要的原因，其建立在游牧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分散性才是深层次主因。^① 后者的结论着眼于游牧社会内部结构的固有缺陷，一经刊出后遂成定论，此后刘锡淦、陈文胜等人的研究也没有超出过林氏的框架。^②

如果说在东西突厥分裂的原因上学术界还能大体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两者正式分裂的时间和西突厥汗国的创建人这一问题上则呈现出了多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王譔在上引文章中批驳了《新唐书·突厥传》、沙畹《西突厥史料》、岑仲勉《突厥集史》等以达头可汗为西突厥汗国创始人的主张，提出了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的新说；而在西突厥汗国形成的时间上，王氏则遵循旧说，认为突厥内战爆发之日（582～583年之间）即为西突厥汗国创建之年。

由于该文提出了“西面可汗”和“西方可汗”这两个容易造成混乱的概念以及语多推测之辞，很快便引起了学界的争议。段连勤最先撰文，对王譔的说法表示反对，并捍卫了“达头可汗创始说”这一传统观点。^③ 继而薛宗正发表了《西突厥开国史考辨——兼评沙畹说和王譔说》一文，在批驳王说的同时提出了“西突厥建国是达头叛乱失败的历史产物，其创业君主为泥利可汗”的第三种观点，而建国时间则为公元603年。^④ 吴玉贵强调阿波系可汗的“东突厥叛乱集团”身份，而认为室点密系的射匮可汗才是西突厥汗国的创立者，创立时间也相应延后到了610年。^⑤ 对这一说法，薛宗正再次撰文表示反对。^⑥ 再加上早年的巴尔托里德的观点——“统治西部诸汗自始就是完全独立的”^⑦，即室点密时期西突厥汗国已经形成，一时间“室点密说”、“达头说”、“阿波说”、“泥利说”、“射匮说”相映成趣，在西突厥汗国创始人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五可汗争立”的局面。

在笔者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史籍记载的不确定之外，突厥汗国大小可汗分领一方的政治结构以及内战时期（583～603年）各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才是关键。对以上争议，薛宗正在2008年发表了《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一文，对各种说法进行了批判总结，明确提出“西突厥是一个政权概念，不等于突厥的西部地区，不等于室点密系的西部封国，不等于内战中形成的西部联盟。突厥内战实质上是一场大汗名号争夺战，内战中分化出来的东、西两大集团并不意味着突厥汗国的真正分裂。达头、阿波都是大汗地位的争夺者，与西突厥汗国的建立无关。这一汗国的诞生乃是突厥20年内战的最终结局。”^⑧ 薛氏认为，西突厥汗国形成于603年，泥利可汗是其创立者。

① 林幹《略论西突厥史中的若干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

② 刘锡淦《论突厥汗国的分裂》，《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陈文胜，胡耀先《突厥汗国分裂原因浅探》，《前沿》2004年第8期。

③ 段连勤《关于西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兼与王譔同志商榷》，《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④ 薛宗正《西突厥开国史考辨——兼评沙畹说和王譔说》，《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⑤ 吴玉贵《西突厥新考——兼论〈隋书〉与〈通典〉两〈唐书〉之“西突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⑥ 薛宗正《西突厥开国史续辨——兼与吴玉贵同志切磋论难》，《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

⑦ 巴尔托里德《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版）第5卷，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8年，第20页。

⑧ 薛宗正《从西部突厥到西突厥汗国》，《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二、西突厥汗国的疆域、属部及其两厢十箭制度

作为一个曾经统治“东至突厥国，西至雷蜚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①的广大地域的草原帝国，西突厥汗国的疆域、属部，及其独特的两厢十箭制度也多为学界所关注。

在这一领域，林幹先生发表于1982年的文章《略论西突厥史中的若干问题》依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文中林氏指出鼎盛时期的西突厥疆域远超过《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中所记与波斯分界的“铁门”，应当还包括了印度河西北的嚙哒旧壤和吐火罗故地。蓝琪在林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勘定，认为统叶护可汗时期的疆域最适宜作为西突厥的疆域标准，即“东面东北面以金山为界与东突厥接壤。北面沿巴尔喀什湖北岸一线一直延伸向咸海以北。西北面沿里海北岸到伏尔加河流域一带。西面以里海东岸为界。西南面在阿姆河以南到喀布尔和迦湿弥罗以北（包括吐火罗地区，但不包括谋夫）。南面在于阗以南（包括于阗）。东南面，沿塔里木盆地北缘一线，到伊吾（包括伊吾，不包括鄯善、且末）。 ”^②此外杨建新也对西突厥的疆域进行了探讨。^③

关于西突厥的属部（即政权内的部落构成），以及由此形成的迥异于东突厥的两厢十箭制度，目前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在上引文中，林幹对左右两厢所辖的十姓部落进行了整理，并对十姓之外的异姓突厥部落也加以考订。1984年杨建新在其文《西突厥的形成、属部及其有关问题》中认为，咥利失可汗时期确立的“五咄陆”、“五弩失毕”十箭部落已经与西突厥初期的十姓部落在构成上有了很大不同。在《关于西突厥“十姓部落”演变之我见》一文中，刘锡淦的研究支持了杨建新的观点，同时刘氏更进一步将“十姓部落”之演变总结为前、中、后三期四个阶段。^④薛宗正于1987、1988年发表的《西突厥的属部、属国与西域的突厥化》^⑤和《西突厥两厢、十姓的起源——兼论西突厥初世、中世的政治纷争》^⑥两篇论文中认为，左右两厢制度起源于西突厥政权中“室点密系”与“阿波系”两系可汗各自统领部落之不同，并将这一肇始于政权初建时期的分歧与汗国中后期的政治纷争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颇具启发性，对我们理解两厢十箭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与这一课题相关的研究还有戴云客的《西突厥部族之构成及其与唐代的关系》、吴疆的《西突厥汗国的“十箭两厢”制》等论文。^⑦

三、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关系

从西突厥汗国的诞生开始，这个政权就与隋唐中原王朝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的互动

①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79页。

② 蓝琪《试述西突厥汗国的疆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③ 杨建新《西突厥的形成、属部及其有关问题》，《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

④ 刘锡淦《关于西突厥“十姓部落”演变之我见》，《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⑤ 薛宗正《西突厥的属部、属国与西域的突厥化》，《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⑥ 薛宗正《西突厥两厢、十姓的起源——兼论西突厥初世、中世的政治纷争》，《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⑦ 戴云客《西突厥部族之构成及其与唐代的关系》，《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吴疆《西突厥汗国的“十箭两厢”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关系是我国中世史上的重要课题。

1981 年陈国灿发表了《论西突厥部族与隋唐王朝的关系》一文，对公元 6～8 世纪西突厥与中原王朝之间从“朝贡”到“册授”关系的转变进行了梳理，指出西突厥属于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西突厥政权是唐朝属下的地方民族政权。^① 张兴胜在他的文章中也对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唐朝最初与西突厥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对付东突厥的基础上的，随着东突厥汗国的灭亡，两者的关系逐渐发展为敌对，而唐朝征服西突厥则揭开了经营西域的序幕。^② 蓝琪则强调在西突厥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以友好关系为主，而发展友好关系的主因源于西突厥汗国的周边政治环境以及经济需求。^③

除上述以宏观视角探讨西突厥与隋唐关系的研究之外，以具体史实探讨两者关系之细节的文章也有发表。如华涛《唐代西突厥都曼起兵史事考》一文，通过苏定方平定思结都曼起兵一事，揭示了唐朝统治西突厥诸部的困难和复杂性；^④ 李大龙则考察了西突厥与唐朝之间使者往来的状况，对使者在双方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性给予了客观的评价。^⑤ 在《西突厥内乱与唐置月氏都督府》一文中，王欣对唐朝在吐火罗故地设置月氏都督府一事详加考证，指出原属西突厥后又属唐的吐火罗叶护具有较大的独立性，月氏都督府并没有削弱吐火罗叶护的势力，而唐朝则期望吐火罗叶护成为阻挡大食东进扩张的重要力量。^⑥

此外，对西突厥汗国灭亡后唐朝在其故地设置的羁縻府州的研究也可以折射出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论文有薛宗正的《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始末》、《唐金山都护府钩沉》，杨尘的《唐昆陵、濠池都护府设置时间辨析》，吴玉贵的《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的关系》等。^⑦

四、西突厥汗国与其他政权的关系

西突厥汗国地处亚洲腹地的中西交通要冲，控扼丝绸之路中段，除隋唐王朝之外，其与周边其他政权的交流也十分频繁，并在东西方的贸易与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此，学者们也不乏关注。

在西突厥与高昌王国的关系方面，姜伯勤在 1990 年发表了《高昌麹氏朝与东西突厥——吐鲁番所出客馆文书研究》一文，他利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首次对高昌麹氏王朝与阿波、泥利、

① 陈国灿 《论西突厥部族与隋唐王朝的关系》，《历史教学》1981 年第 7 期。

② 张兴胜 《论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西北史地》1996 年第 3 期。

③ 蓝琪 《西突厥汗国与中原诸王朝的关系》，《贵州师大学报》1998 年第 1 期。

④ 华涛 《唐代西突厥都曼起兵史事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 年第 3 期。

⑤ 李大龙 《唐王朝与西突厥互使述论》，《民族研究》1995 年第 5 期。

⑥ 王欣 《西突厥内乱与唐置月氏都督府》，《西域研究》2000 年第 2 期。

⑦ 杨尘 《唐昆陵、濠池都护府设置时间辨析》，《西域研究》1998 年第 3 期；薛宗正 《唐金山都护府钩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及《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吴玉贵 《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的关系》，《新疆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

处罗三位可汗在位时期的西突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① 沿着这一史籍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研究路线,吴玉贵、王欣、王新民、钱伯泉、薛宗正等学者也先后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② 西突厥与高昌王国的关系至此得到了充分论证。

在西突厥与吐蕃的关系方面,薛宗正在其出版于1992年的专著《突厥史》中辟有专节,对吐蕃势力扩张到西域后与西突厥发生关系的史事以及西突厥附蕃政权的兴衰进行了考证。^③ 杨铭在《唐代吐蕃与突厥、回纥关系述略》一文中,则运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等与汉文史籍互参,厘清了某些关键史实。^④ 周伟洲先生的相关研究则勾勒出了吐蕃如何与西突厥联盟进而从唐朝手中夺取西域控制权的全过程。^⑤

在西突厥与波斯、东罗马(拜占庭)等丝绸之路西段国家的交往方面,蓝琪最先发表了她的研究成果。在1986年的《西突厥汗国与萨珊波斯的关系》一文中,她将两国的关系划分为“互为盟国时期”和“互为敌国时期”两个阶段,而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则是公元567年嚧哒汗国的灭亡。^⑥ 在之后的研究中,蓝琪又利用中西方史料对西突厥汗国与东罗马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指出两者最初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交往,直到西突厥与萨珊波斯的关系恶化后,两国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才发展成为了政治上的联盟关系。^⑦ 张绪山则重点考察了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丝绸贸易。^⑧

对于西突厥在东西方交往上的这种重要枢纽作用,学者也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总结。这方面的文章有莫任南的《突厥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郭泽宝的《西突厥汗国的兴盛与历史进步作用》、李明伟的《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功绩和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等。此外,阎静生还对西突厥人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渊源进行了考察。^⑨

① 姜伯勤《高昌麹氏朝与东西突厥——吐鲁番所出客馆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 参见吴玉贵《高昌供食文书中的突厥》,《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王欣《麹氏高昌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王新民《麹氏高昌与铁勒突厥的商业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钱伯泉《从传供状和客馆文书看高昌王国与突厥的关系》,《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薛宗正《麹伯雅生平析疑——麹氏高昌与突厥木杆、室点密两大汗系及隋朝的关系》,《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2期。

③ 见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10~623页。本节研究成果已整理成论文发表,见薛宗正《噶尔家族与附蕃西突厥诸政权——兼论唐与吐蕃间的西域角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④ 杨铭《唐代吐蕃与突厥、回纥关系述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⑤ 周伟洲《唐代吐蕃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7辑),2010年,第84~93页。

⑥ 蓝琪《西突厥汗国与萨珊波斯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⑦ 蓝琪《西突厥与东罗马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⑧ 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

⑨ 参见莫任南《突厥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6期;郭泽宝《西突厥汗国的兴盛与历史进步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李明伟《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功绩和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阎静生《西突厥人与土耳其的渊源》,《西北史地》1999年第4期。

五、相关人物、地望的研究与考证

人物是历史事件的承载者，而地望则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处，对两者的考察在历史研究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西突厥的历史，自然不能对其相关人物和地望视若无睹。

在人物研究方面，学界对于西突厥汗国创始和末世诸汗的关注相对较多。由于前文提到的对于西突厥汗国创始人的争议，直接影响到了“泥利可汗”这一重要人物的身份问题。刘锡淦在《试解突厥泥利之谜》一文中，从“西突厥可汗即室点密系可汗”这一前提出发，认为叛乱的泥利可汗只是东突厥汗国的一个方面小可汗而不是西突厥的大汗，并得出了历史上有两个泥利的结论。^①薛宗正的看法则与之截然相反，他认为只有一个泥利，他是阿波可汗之孙，是西突厥汗国的大可汗和实际开创者。^②

与泥利可汗有相同遭遇的还有西突厥末世诸汗之一的阿史那弥射，由于史籍记载的模糊和混乱，学界对他的身份也存在两种不同看法：薛宗正认为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泥孰乃是同一人，两个名字实属同音异译；^③而吴玉贵则反驳说，弥射与泥孰实为两人，唐使刘善因册封的西突厥咄陆可汗是泥孰，而非阿史那弥射。^④

阿史那弥射的孙子阿史那献作为唐朝册封的第三代“兴昔亡可汗”，历任昆陵都护、北庭大都护、致远道行军大总管等显职，是唐朝在西域实行羁縻政策的重要执行人，然而史籍对其生平史事记载颇为简略。近年先后有孟凡人、陈瑞芳、薛宗正等学者以出土文书与史籍相结合，对其事迹进行了还原与考证，再现了这位西突厥“十姓可汗”的一生际遇。^⑤此外，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阿史那贺鲁降唐诸说考异》、《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始末》等。^⑥

在地望研究方面，西突厥的汗庭所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从室点密时期开始，西突厥建牙之地受政治局势的影响曾数度迁徙。其最初的汗庭，即室点密、达头牙帐所在，沙畹考证位于“库车北山外之特克斯河流域”；^⑦而日本学者松田寿南则认为在特克斯河之东的大裕勒都斯河谷地。^⑧其中松田氏之结论影响甚巨，被我国许多学者所采用，如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即标西突厥汗庭于彼地。然而之后此说受到了林梅村的质疑，林梅村结合自己实地考察所得，认为西突厥汗庭“从来不在大裕勒都斯河谷。它最初设在天山北麓特克斯河北岸阿克达拉，后来又在赛里木湖东南岸科克喀木尔山之西增设北庭。尔后，西突厥王庭西迁中亚七河流域，先在塔拉斯河上游德米特里耶夫村附近的千泉，后移至楚河北岸南距托克玛克东南阿克贝西姆古城约20公

① 刘锡淦 《试解突厥泥利之谜》，《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② 薛宗正 《突厥史》，第276～277页。

③ 薛宗正 《阿史那弥射生平析疑》，《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④ 吴玉贵 《阿史那弥射考》，《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

⑤ 孟凡人 《阿史那献辑传注释》，见氏著《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7～256页；陈瑞芳 《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献事迹考》，《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薛宗正 《阿史那献生平辑考》，《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⑥ 吴玉贵 《阿史那贺鲁降唐诸说考异》，《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薛宗正 《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⑦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 《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212页。

⑧ 〔日〕松田寿南著；陈俊谋译 《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347页。

里的揭丹山。”^①

统计叶护可汗时期，西突厥统治重心西移，汗庭也迁至七河流域的千泉。然而千泉的具体位置也存在几种不同说法。周连宽认为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以东140~150华里的阿该尔托布与泼得果尔诺之间及其附近地区；林梅村考证在塔拉斯河上游德米特里耶夫村一带；而许序雅则支持日本学者松田寿南的研究，认为应该在今哈萨克斯坦梅尔克地区。^②

至于与西突厥汗庭关系密切、后来又成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的位置所在，自从张广达先生考证其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南之阿克贝希姆古城后，学界虽仍有异议，但近年之考古发现日益证明了其推断之正确性。^③关于西突厥汗国内其他地望的研究，还有孟凡人的《略论可汗浮图城》，张荣《7世纪上半叶“前庭州地区”历史考述》等。^④

六、考古发现及其他研究

除以上热点问题之外，吴玉贵在《贞观年间西突厥历史述考》一文中，对史籍记载的唐初西突厥头绪繁多而又互相龃龉的历史进行了梳理；魏良弢撰有《突厥汗国与中亚》一文，论述了西突厥汗国对中亚历史的深远影响，而台湾学者朱振宏也发表了他有关西突厥的两篇最新研究成果。^⑤

在考古发现和研究方面，有关突厥的考古一直是我国边疆游牧民族考古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但近年这一情况已经逐渐得到了改观。欧亚草原上广泛存在的石人，被认为是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13世纪游牧民族的遗存，其中遍布于蒙古草原的6~8世纪石人，则多被认为是突厥的遗存。在我国新疆地区历史上属于西突厥汗国的地域内这类石人也多有发现，其研究成果在王博、祁小山的专著《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⑥中多有体现。与草原石人同时并存的往往还有许多石棺墓、石堆墓遗迹，今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阿勒泰、富蕴、青河、哈巴河、吉木乃、布尔津等地都有发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阿尔卡特草原地区的石人石棺墓也比较集中；伊犁地区的昭苏、特克斯、察布查尔等县，亦有石人石棺墓分布；而在天山以东的哈密、巴里坤、伊吾、

① 林梅村《西突厥汗庭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② 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91页；林梅村《西突厥汗庭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许序雅《千泉、白水城和恭御城考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期。

③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钟兴麒《唐代安西碎叶镇位置与史事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李志敏《唐安西都护“两四镇不同”问题述要——碎叶镇城地望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周伟洲《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唐研究》第6卷，2000年，第383~394页。

④ 孟凡人《略论可汗浮图城》，《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张荣《7世纪上半叶“前庭州地区”历史考述》，《新疆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⑤ 吴玉贵《贞观年间西突厥历史述考》，《中亚学刊》第4辑；魏良弢《突厥汗国与中亚》，《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朱振宏《西突厥建国考》，《中国边政》2008年，总173期《隋朝与西突厥关系研究》，《中国边政》2009年，总178期。

⑥ 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奇台、木垒、吉木萨尔等地以及天山以南的温宿也有发现。^① 这些墓葬的族属一般多被认为是突厥或臣属于突厥的铁勒诸部，虽然考古工作者已经对部分墓葬进行了发掘，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问世。1997 年昭苏县的三座墓葬曾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有学者认为应属于西突厥贵族的遗存，^② 但王炳华的研究显示，这批墓葬的主人更有可能是 5 世纪时统治伊犁河流域的悦般人。^③

此外，陕西咸阳地区还发掘了西突厥末代可汗阿史那怀道夫妇的合葬墓，^④ 墓中出土了 500 余件文物和两通墓志，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公布发掘报告。

以上我们简单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我国西突厥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西突厥历史关注的重点多集中于政治史范畴，而其经济、文化、宗教及社会结构等领域则乏人问津。这种情况或是由于史料匮乏所限，或是因其与东突厥无甚差别而总括于整体性的突厥研究之内。如蔡鸿生对于突厥文化的研究，^⑤ 自然包含了对西突厥文化的考察。同样，林幹、薛宗正、吴玉贵等学者对西突厥的研究也容纳在了他们研究突厥民族的三部学术专著（林幹《突厥史》^⑥、薛宗正《突厥史》^⑦、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⑧）当中。然而就对后世新疆及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而言，西突厥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其在各个领域仍有细化研究的必要。在未来的研究当中，将传统史料与考古发现、古文字材料结合起来，并引入人类学的视角和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庶几能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

（作者系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文博

责任校对：陈霞

① 参见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3 年第 12 期；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报》，《文物》1962 年第 7、8 期合刊；李遇春《博尔塔拉自治州石人墓调查简报》，《文物》1962 年第 7、8 期合刊；王炳华《天山东部的石雕人像》，《新疆文物》1985 年第 1 期；林梅村《阿尔泰山和天山的大石冢》，《欧亚学刊》第 3 辑；刘学堂，吕恩国《新疆三海子金字塔式“巨石冢”的文化性质及其他》，《中国文物报》2002 年 8 月 23 日，第 7 版。

② 安新英《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 年第 9 期；于志勇《新疆昭苏西突厥黄金宝藏》，《文物天地》2000 年第 2 期。

③ 王炳华《新疆波马金银器》，原载〔美〕代顿博物馆编《古代中国丝路艺术》，2002 年，已收录于《西域考古历史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79～694 页。

④ 林梅村《咸阳发掘出西突厥可汗墓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 年第 6 期。

⑤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 年。

⑥ 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

⑦ 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⑧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